骏马奖作家观察（二十三）

城乡互动与故事的新讲法

——娜仁高娃创作论

□李翠芳

娜仁高娃以精神书写深化地域经验、以生态反思直面生存现实、以民族叙事对接中国故事，建构了多维度的文学世界。她的创作实践表明，民族文学只有以开放姿态拥抱现实，在表现乡情人心、守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映照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而复杂的现实世界，才能实现从民族故事到中国经验的跨越



《驮着魂灵的马》，娜仁高娃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七角羊》，娜仁高娃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8月　　《影》，娜仁高娃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

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致力于民族生活的现实书写，近年创作非常活跃。她的小说聚焦内蒙古西部沙地，呈现出这样一些创作特征：忠实于情感体验，注重地域性经验之上的精神书写；从生态视角切入观照现实，正视游牧生活与城市化现实的冲突与融合；积极探索如何将民族故事有效提升为中国故事，为民族作家表现多维现实提供可供借鉴的新路径。

地域经验与精神书写

娜仁高娃的创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质，生动描绘了沙漠腹地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生活场景。其小说描写了给马群打印、挤驼奶、薅醉马草等劳作细节，这些与农耕传统和现代都市迥异的场景充满陌生化的吸引力，为多民族文学书写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艺术资源。难得的是，作家并未对这些场景进行“狂欢化”展示，而是以自然舒缓的笔触还原沙窝地日常，将精神追求与价值体悟寄寓其中，彰显出沙窝地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

娜仁高娃注重内心表达与精神写作，草原万物有灵的文化基调赋予其作品独特的审美特质。作家巧用拟人、夸张、通感等修辞重塑沙地自然意象，如将流云喻为“有人在天上抽烟”，将久旱视为“苍天在打盹儿”。这套依托心灵感知的语言体系使其小说具有了诗歌的空灵质感，形象传递出沙窝地人敬畏生命、与自然共生的生命意识。作家还擅长运用马、骆驼、石头、风等特殊视角来拓展生命思考的维度。这些叙事主体看似受限，却凭借漫长的生命跨度沉淀出对世界的沉静、厚重的感悟，赋予文本浓厚的哲学意味。

干旱苦寒的半荒漠环境造就了沙窝地人坚韧英勇的品行，也催生了他们对生命的渴望和珍视。沙窝地人的生命观兼具乐生与敬死双重内涵，形成了宽厚通透的生命哲学。小说集《驮着魂灵的马》完成了对死亡的多样化呈现，同名小说接连写羔羊、爱马、妻子、众人与“我”的死亡，却摒弃浓烈悲怆的情绪渲染，反而表现出对生命的温柔追忆与直面死亡的从容。在朴素的民间认知中，死亡并非终点，而是精神升华与灵魂救赎的契机。《野地歌》中的老马萨热泰在雷雨中护主而亡，传承了游牧民族的忠勇风骨，完成了对先祖的致敬；《鹰舞》中的主人公困于误伤友人的负罪感，最终通过死亡消解内心枷锁，实现灵魂的解脱；《醉阳》中的老人在公羊莫七身上感知到了亡人的魂灵，以此消解离别之苦；《一条狭长地带》中的主人妥善安置老驼王遗骸，期盼生灵再度降临故土。

死亡并非终结，它指向重生与希望，世俗伤痛被消解，人与万物缔结微妙的联系。草原的生死观进而成为沙窝地人丰富厚重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娜仁高娃深刻体察到沙窝地人的双向精神特质：一面认真劳作、不负此生，一面平静坦然面对生命，自由而充满尊严。沙窝地人看似粗粝实则细腻，看似漠然实则温情，彰显出深层的人文价值和文学内核。

生态写作与生存思考

草原游牧文化深植于娜仁高娃的血脉之中，草甸、沙湾等独特地理景观，逐水而居、赶牧牛马等日常图景，蒙医疗病、婚丧祭祀等民俗仪式，共同构筑了沙窝地的风土人情。这些民族特质并不是小说的装饰性外包装，而是作家审视现代化转型、反思文明发展的切入点。

娜仁高娃首先关注到了生态危机与家园失落。《背石头的女人》《玛楠河礼物》《神的水槽》等多篇小说反复写到沙地连年无雨、草场贫瘠、牲畜饥亡的生存困境。而相比自然天灾，人为无序的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更加触目惊心：《乳山》中的城里人炸毁圣山乳山，《石兽》中的采石队留下深坑疮疤，《天边的肩胛骨》中的煤矿遗址滋生诡异灾象……作家运用魔幻笔法渲染场景，直观呈现人类掠夺式开发招致的反噬。作家更以生育危机来隐喻生态的衰败，生育危机与生态危机相呼应，表达了作者敬畏自然、守护乡土的创作立场。

草原上的“围栏”则将作家的忧患意识指向更深层次。围栏分割了草场的物理空间，也瓦解了草原人的和谐生态和文化精神。围栏“围起的不仅仅是牧场空间，更构造出一个政治、竞争、贪婪、自私的社会空间”。在《门》中，围栏导致孩童天然乐园的丧失；在《离天堂最近的蝴蝶》中，父亲因草场权属纠纷伤人致死；在《送亲歌》中，围栏圈定老井，乌尼尔一家取水困难；在《苍青色长角羊》中，草场边界纠纷加剧了亲人间的隔阂。农耕与工业文明持续向草原延伸，原生态游牧生活成为渐行渐远的浪漫想象，其间表现出作者的文化焦虑。

娜仁高娃真切体察着乡土、民族和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困惑和失落，也在思考草原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存续现状与传承路径。去留问题成为盘旋于沙窝地两代人心中的核心问题。在《离天堂最近的蝴蝶》《玛楠河礼物》等小说中，年轻一代奔赴城市，谋求新生活；在《沙窝地》和《醉阳》中，老一辈坚守草原，拒绝迁居；也有人外出漂泊多年，晚年重返故土，如《戈壁》中的卡车司机和《裸露的山体》中的游子。娜仁高娃正视游牧传统与都市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既共情老牧民被现代化所裹挟的失落，也体谅新一代在都市中的彷徨，在“出走/留守”的对照书写中，完成对草原生存的现代性反思。

三种不同的主题模式

娜仁高娃依托沙窝地的地方性知识，扎根民间现实，打破空间壁垒，打通了民族叙事与中国故事的内在关联，彰显了中国本土故事的张力，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叙事领域。城市化、现代化浪潮持续冲击并重塑着传统生活方式，娜仁高娃聚焦时代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着力刻画人物在不同时空中的内在心理变化，通过独特的情感、经验和故事，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主题模式。

一是精神困境的呈现与突围。娜仁高娃的写作并不注重情节冲突和故事反转，而是专注于表现现代人的精神挣扎：或困于愧疚（《鹰舞》），或困于欲望（《玛楠河礼物》），或困于爱的匮乏（《石兽》），或困于性别枷锁（《送亲歌》《草地女人》）。这些其实是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普遍性困境。作者更积极探寻突围之径，她笔下的人物执着于寻找，或寻找如阿如戈、化石之类的具体器物，或寻找力、善与美等形而上意义，从而获得精神救赎。

二是以血缘温情化解代际冲突。经济转型和文化变迁激化了代际矛盾，娜仁高娃笔下的代际对立并非源于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对立，而是缘起于具体事件，如童年经历、家庭丑闻等。这些事件使父子之间产生隔膜或对抗性。但是血缘亲情最终促成代际和解：在《离天堂最近的蝴蝶》中，父亲离世，儿子延请喇嘛为其超度释怀；在《裸露的山体》中，萨拉意识到自己与父亲越来越相似，由此完成自我和解；在《地下瓶子》中，新生命的降临消解了代际隔阂。娜仁高娃的代际书写跳出对立模式，注重源自血缘、稳于伦理的情感召唤，体现出温情和凝聚性。

三是以文化视角书写城乡互动。新时期以来有一些城乡题材小说割裂城市与乡村，塑造“物质/城市”“精神/乡土”的二元对立形象，娜仁高娃则侧重书写城乡文化的交融互通。在《离天堂最近的蝴蝶》中，主人公定居城镇，却心系故乡，他以在城中古董店售卖马鞍、马灯、毡靴等乡间旧物来连接城乡记忆。在《戈壁》中，闵布德父女极力平衡城市生活与乡土精神，父亲以传统早餐消解城市的陌生感，女儿以特殊文身承载家族记忆。娜仁高娃通过城乡共存互通来探寻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承续问题，以文化视角充盈现实写作。

娜仁高娃的小说中还穿插着大量的《江格尔》史诗、草原动物传说、乡间民俗故事等，这些民族文化记忆将现实、心灵、历史、想象并置，形成当下与传统、真实与想象的互文对照。作家对文化和精神的观照由此上升为集体心理与民族精神体系，贵智尚勇、敬畏天地、坚韧向善的草原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高度契合，拓展了民族经验所连接的精神世界。

总体来说，娜仁高娃以精神书写深化地域经验、以生态反思直面生存现实、以民族叙事对接中国故事，建构了多维度的文学世界。她的创作实践表明，民族文学只有以开放姿态拥抱现实，在表现乡情人心、守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映照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而复杂的现实世界，才能实现从民族故事到中国经验的跨越。这为新时代中国多民族文学书写现实、表达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2CZWJ02）阶段性成果］

残阳不落　丹心永存

——评李志仙电影文学剧本《残阳如血》

□张昭强

作家李志仙发表于《中国作家》2026年第2期的电影文学剧本《残阳如血》，以1934年云南班洪抗英事件为历史蓝本，将西南边疆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的悲壮历史，凝练成一部富有张力的剧作。剧本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以“木刻箱”为叙事与精神的双重锚点，熔家国大义、民族气节与个体命运于一炉，既回望了边疆抗英历史，也完成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诠释。

历史题材创作，始终绕不开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命题。班洪抗英事件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的重要一页：英军为掠夺佤山资源悍然入侵，班洪王召集十七部落王剽牛盟誓抗敌，李希哲组建“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千里驰援，最终佤族同胞以祖传信物为铁证，英勇捍卫了领土完整。这段历史本身极具戏剧张力，《残阳如血》既未陷入流水账式的历史复刻，也未为追求冲突随意解构历史，而是精准找到了书写历史的最佳契合点。

剧本以“木刻箱”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麦高芬”。这只装着吴尚贤木刻、李定国矿脉图与历代王朝颁赐官印的木箱，既是领土归属的法律物证，也是阿佤人数百年坚守的精神图腾，更是驱动全剧戏剧冲突的叙事引擎。剧本始终以木刻箱为线索，将分散的历史事件、庞杂的人物群像收拢在统一的叙事框架中，让抽象的历史有了具象载体，让宏大的家国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情感落点。

剧本对历史细节的还原，绝非猎奇式的民族元素堆砌，而是将佤族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度融入叙事肌理。从剽牛盟誓时“头颅可碎，此心不渝”的誓言，到木鼓传讯、拉木鼓祭祀的民俗呈现，剧本对佤族文化的描摹，始终与剧情推进、人物塑造深度绑定，既还原了历史场景的真实感，也让观众读懂了佤族人民对土地敬畏、对家国忠诚的精神底色。各族武装并肩作战的情节，更清晰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逻辑：这场抗英斗争不是单一民族的孤军奋战，而是西南各民族同心协力、共御外侮的集体抗争。

人物是剧作的灵魂。《残阳如血》最动人的突破，在于打破同类历史题材常见的人物脸谱化窠臼，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有完整成长弧光的人物群像。

主角艾普完成了从“部落勇士”到“民族英雄”的完整成长。他出场时是班老部落身手矫健、熟稔山林的年轻武士，对木刻箱的守护最初源于对祖先的承诺与对班老王的忠诚。在与娥孟出生入死、见证英军残暴与同胞牺牲后，他的视野从“守护部落”拓展到“捍卫家国”，完成了精神层面的成长。剧本中最具震撼力的情节，是艾普最终倒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用尽最后力气质问：“你们……是中国人吗？”这声泣血质问，是对这些人屈膝投降、残害同胞的悲愤控诉。

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跳出了“男性英雄附属品”的创作窠臼。女主角娥孟是义勇军指挥长李希哲的女儿，是与艾普并肩作战的战友。断头崖救人、南滚河枪战等情节，尽显她的果敢冷静。她与艾普的爱情是战火中同生共死的灵魂契合，始终与家国叙事同频共振。剧本结尾，娥孟抱着艾普的遗体立下血誓，更让这个人物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即便是反派与配角，剧本也拒绝扁平化处理，人物均有符合自身立场的行为逻辑与性格底色，共同构成鲜活的历史群像。

《残阳如血》在剧作结构与视听语言的构建上，展现出成熟的创作功底。剧本采用经典三幕式叙事结构，融入民族叙事的传奇色彩，节奏张弛有度，高潮处从抗英胜利急转到国民党政权背信弃义导致的悲剧，形成强烈的戏剧反转。结尾处60年后南木林回乡寻根的段落，让历史与当下形成跨时空对话，剧本主题也从记录历史升华为铭记精神、传承血脉。剧本的文字兼具文学性与视听化属性。“残阳如血”的意象贯穿全剧，既是故事的视觉底色，也是那段悲壮历史的精神象征。

《残阳如血》以艺术的方式打捞了一段被淡忘的西南边疆抗英历史，深刻诠释了家国同构的精神内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叙事多聚焦于中原与沿海地区，西南边疆地区的故事较少被关注。这部剧本将佤山儿女的抗争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坐标系中，清晰展现出边疆人民在国家危亡时刻，以血肉之躯筑起祖国西南门户屏障的担当。这种刻在血脉里的家国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根本所在。残阳终会落幕，丹心永不磨灭。希望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家国信仰与精神力量，最终能够登上银幕，抵达广大观众。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岁月有诗相伴

——读黄成松诗集《在暮色中抵达》

□吴道毅（苗族）

黄成松是从贵州西部大山走出的苗族农家子弟，对文学有着执着的追求。对他来说，诗，抑或广义的文学，不仅是一种兴趣或展示艺术才情的领地，更是精神的栖居地。在诗中，他一方面歌颂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一方面思考人生、领悟生活哲理。

歌颂真善美是成松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他的诗集《在暮色中抵达》正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成松是一位现实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劳动、耕耘、收获让他感受到创造的喜悦，亲情、爱情、友情让他体察到人情的温暖，山川、树木、花草、落叶让他领会到自然的神奇与生命的律动，觉察到生命动人的光亮。作为农家子弟，成松对农耕文化或乡土文明抱有由衷的热爱，对农村父老乡亲的命运感同身受。《麦子熟了》这样歌颂麦熟带来的喜悦及辛劳与汗水创造的收获：“饱满的麦穗/尖锐的麦芒/让人看了心里踏实”，因为“麦子熟了/这不仅是一个庄稼人的收获/更是一群人的收获/一个民族的收获”。从这些浅显而饱含热情的诗句中，读者不难领会到谷物成熟与收获的深刻意义，它关乎人类的生存，也是农民勤劳、智慧与坚韧品质的体现，内中包含着朴实而深厚的生存哲学。诗人接着表明写作心迹，展现对父老乡亲的体恤：“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最关心的就是脚下的土地/这饱满的麦子/饱含了多少庄稼人心血啊。”成松走进了城市，又把农民之子的初心留在乡村，父老乡亲的欢乐悲辛始终牵引着他那颗柔软的心。

在描绘甘南风情的《在暮色中抵达》中，有这样的动人诗句：“从草原更高处走来的牛羊、马匹/在主人的吆喝下进入栅栏”“那里村舍依傍山峦/隐约传来几声犬吠”。这些诗句书写草原牧业活动的片段或乡村恬静生活图景，昭示出乡村生活和平而富于生机的美好画面。《长滩河的馈赠》这样赞美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丰厚的馈赠”：在果品匮乏的三月，长滩河浇灌的白菜园长出鲜甜菜薹，让孩子们当水果吃；五月麦熟时，“沉甸甸的麦地”“让人感觉到安全和满足”。《坡地上》中，细雨对豌豆苗的滋润及豌豆苗的开花，体现出大自然对生命的馈赠，也体现出生命本身的力量……

追问人生的意义，思考生活的哲理，是成松诗歌的另一重要主题。对他而言，诗歌是人类思考与追求生活的方式，甚至就是生活本身。他坚信，因为诗歌或文学，人类得以探求与解开自然、社会与自身的奥秘，得以开辟超越庸常纷扰和世俗生活之路，让精神生活更加丰饶和富于激情，甚至因为有诗歌或文学，人类才会在漫漫长夜中等来黎明。《人要活得像条河流》以长滩河为样板，揭示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与奉献。长滩河的特点有二：一是“出现在旷野，就把土地滋润/太阳照射，万物生长”，二是“出现在高山，就化身为万丈飞瀑/月光落处，万籁俱寂”。它有这样的精神品格：“不管是静，是动/不管枯荣，抑或生死/都要把生命的力量尽情释放/在荆棘上捧出鲜花和果实/在荒原上捧出牛奶和蜜。”长滩河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及孕育万物的品格，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也给读者带来启示。

《荒野哲学》写到两种荒野事物：一是野刺梨，它最突出的习性是“秋天果实成熟/又为山中饥饿的旅人或鸟兽/提供甘甜的餐食”；二是野山泉，它的突出特点是“树木有它的滋润更茂盛/花草有它的浇灌更艳丽”，“那些长途跋涉的旅人/也是从野山泉那里/汲取了走下去的勇气和力气”。这些荒野中名不见经传的微小事物，都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都在奉献自己，带给人类关于生命意义的启示。其他如《沉默的长滩河》《永远的母亲》《生命教育》《野雏菊在歌唱》《马桑树》《寻医启示》等，都堪称耐人寻味的哲理小诗。

成松的诗歌还有一个写法上的长处，便是善于捕捉与营构新奇别致的意象，注意把握意象对诗歌主题的隐喻意义，表达深刻的生活哲理思考，但含蓄而不晦涩，让读者读来既寻味无穷，又能读懂诗中深意。诗歌艺术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让丰富深刻、直击人心的主题含蓄寄寓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避免直接表露。成松从事诗歌创作一二十年，已深谙这些诀窍，并运用得相当娴熟。

举《一个人上山》为证，诗中写道：“要继续往前/就得清除荆棘/开辟新路/这对于手无寸铁的我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好奇/爬上山顶会看到什么//有时候/山顶的风景总让我们向往/但布满荆棘的山路/还得一个人去走。”这首诗的总体意象是上山，主要描绘山坡上的风景，也写到人对山上风景的向往。上山、布满荆棘的山路、一个人走山路等描写，都会让读者产生许多联想：上山的路难道不就是人生的道路，对山顶风景的好奇或向往难道不就是人生的梦想抑或追求理想的动力？山路越往上走越无迹可寻，清除荆棘、开辟新路，不就是对现实人生道路的象征，以及在面对人生障碍或困境、寻求生机时，每一个个体的积极努力或抗争？诗的价值在于关乎人生，这首诗在看似寻常的上山的生活意象中，包孕着切实而深刻的人生意义。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